

The Tswana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African Native Diaspora Writer Unity Dow

CHEN Yaji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15, 2025

Accepted: August 2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CHEN Yajie. (2025). The Tswana Female Perspective of African Native Diaspora Writer Unity Dow.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061–06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08.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08>. p

The research is on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key project “Hist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s in English” (No. 19ZDA296)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her extensive background in human rights activism, African diaspora writer Unity Dow has successfully crafted a series of iconic Tswana intellectual women in her four novels, vividly depicting the multifaceted structural oppression faced by women during Botswa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resilient coping strateg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reative trajectory and ideological core of Unity Dow’s novels, further pointing out that her literary works, by depicting Tswana intellectual women who possess both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profoundly highlight and enrich feminist thought within the African contextual reality from three key dimen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identity, the reform of marital concepts, and collective empowerment practices.

Keywords: Power; subject identity; feminism; collective strength; Unity Dow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CHEN Yajie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er interests include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English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er email address is 1339297101@qq.com.

非洲本土流散作家尤妮蒂·道的茨瓦納女性觀

陳亞潔

上海師範大學

摘要: 非洲本土流散作家尤妮蒂·道以其深厚的人權活動背景為創作根基,在其四部小說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



具有典型意義的博茨瓦納知識女性形象,展現了博茨瓦納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女性所遭遇的多重結構性壓迫及其富有韌性的應對策略。本文在系統剖析尤妮蒂·道小說的創作軌跡與思想內核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其文學創作通過勾勒兼具思想力和執行力的茨瓦納知識女性形象,並從主體身份建構、婚姻觀念革新和集體賦權實踐三個關鍵維度深刻彰顯並豐富了非洲現實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思想。

關鍵詞: 權力;主體身份;女性主義;集體力量;尤妮蒂·道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項目編號:19ZDA296)

一、引言

尤妮蒂·道(Unity Dow, 1959—)是博茨瓦納傑出的作家、人權活動家,同時也是博茨瓦納高等法院的首位女性大法官,享有廣泛的國際聲譽。她的本土流散經歷與所處的時代背景塑造了她兼具本土意識與國際視野的獨特視角,而律師和人權倡導者的多重身份更使她的作品呈現出深刻的批判性與社會關懷。根據非洲文學學者的定義,『本土流散指的是未曾徙移,但處於異質文化的包圍而在本土流浪的非洲本土作家』(朱振武, 2025: 56),尤妮蒂·道自然也位列其中,其流散書寫作品包括《比遠方更遠》(*Far and Beyond*, 2000)《無辜者的尖叫》(*The Screaming of the Innocent*, 2002)《平衡真相》(*Juggling Truth*, 2003)和《天堂可能墜落》(*The Heavens May Fall*, 2006)四部小說。這些作品大多以博茨瓦納由殖民時代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為背景,聚焦權力運作的隱蔽機制,並透過這一棱鏡,深刻揭示茨瓦納女性在博茨瓦納社會中的生存困境與結構性壓迫。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社會過渡階段的知識女性代表,受到了傳統茨瓦納文化、現代文化以及殖民文化的熏陶。時代和社會的更迭發展並沒有讓女性的地位和生存條件得到應有改善,因而在廣大茨瓦納女性群體沒有實際代言人的情況下,尤妮蒂·道以塑造典型茨瓦納知識女性人物的方式,並從主體身份、婚姻理念和集體觀念三個層面構建自身極具非洲性特征的女性主義思想框架。尤妮蒂·道『所書寫和表現的主題,呼應著世界範圍內女權主義運動的潮流,與其他國家的女權作品匯流,成了兼具非洲性和世界性的文學景觀』(朱振武、薛丹巖, 2024: 122)。她的文學實踐不僅具有鮮明的社會批判意識,更通過文學敘事為改善茨瓦納女性的現實處境提供了建設性的文化想象路徑。

二、主體身份的構建

身份是個體存在的社會認可與證明,關乎個體對於自身的理解和定位,但身份並非自然產生,而是借助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構建形成。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總是會從自身的身份和立場出發。作為接受過現代先進思想教育的女性作家和擁有豐富社會實踐的人權活動家,尤妮蒂·道自覺地將自身對於身份的理解巧妙融入小說創作當中,從小說女性人物對名字的反思、對性別平等觀念的捍衛再到對於民族和國家優秀文化傳統的承繼三個維度立體呈現了茨瓦納知識女性對自身主體身份的建構。

由於名字和名稱是身份象征的典型代表,因此尤妮蒂·道首先從命名方式出發,對茨瓦納女性人物的名字表達了質疑與追問。《比遠方更遠》中的主人公莫薩即是一位在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之間堅守自我、不斷追尋女性主體性的人物。她不甘於重復母親的人生軌跡——忍受家暴、獨自養家、在喪子後沈溺於巫術占蔔的慰藉,而是渴望超越既定的悲苦命運,追求精神上的『遠方』。在博茨瓦納文化中,名字往往是對個體的人生期望,也預示個體的生命追求。莫薩是對自己的女性身份有著清醒認知的知識女性,她對自身身份的探索體現在幾個關鍵層面:首先是對名字的象征意義產生疑問。在博茨瓦納文化中,『Mosa』是

『mosadinyana』(意為『小女人』)暗含對女性家庭角色的固化期待。受過教育的莫薩質疑這一命名,渴望一個更現代、更具獨立意味的名字,以擺脫傳統束縛。

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覺醒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掙脫,更是對性別壓迫結構的直接挑戰,展現了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抗爭與自我重塑。『如果將偵探小說的體裁擴大,道的小說中所呈現的激進的和勇敢的行動者,可能是不可信的,但是無疑象征了未來社會更加美好的希望。』^①例如《無辜者的尖叫》中阿曼特在面臨警官居高臨下的質問時反問道:『這和我的年齡又有什麼關係?』(Unity Dow, 2002:90)。在男警官看來,普通年輕女性沒有資格來質問身穿警服的男性官員,但阿曼特的堅定回應體現了知識女性的力量與底氣。《平衡真相》中的莫內對於女性沒有資格在公眾場合發言產生質疑。如果女性可以在公開場合發言,『我想我的祖母可以去廣場上談談學校裏面孩子們挨打的問題。……但是我猜英國女王確實是在公眾場合講話的,並且她就是一位女性。』(Unity Dow, 2003:76)但顯然,博茨瓦納的女性與英國的女王雖然同為女性,所擁有的權利卻相去甚遠。同為生命個體,博茨瓦納女性不被允許在公眾場合講話,而男性可以在公眾場合發表演論。博茨瓦納各大部落內部都實行絕對的男權主義,女性不具備參政議政的資格,只限於家庭內部的各項瑣事。這一傳統理念無疑與性別平等觀念相悖而行。

基於博茨瓦納社會中女性在不同空間場域頻頻受壓迫的現實,尤妮蒂·道在小說中構建了這樣的社會,『在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身份是不穩固的,處於不斷被擾亂的狀態之中』(Fetson Kalua, 2010:87)。無論是家庭或是社會中,女性群體的身份和生命權一再受到挑戰,進而導致她們不斷為捍衛自身的女性身份而抗爭,並表現出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相結合的特征。她們既不是傳統女性,也不完全屬於現代女性,而是兼具這兩種身份,承載著多種文化的雜糅。尤妮蒂·道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作家本人的化身。與作品中的知識女性一樣,現實中尤妮蒂·道也參與到了多元文化現實當中,正如霍米巴巴所言『那些發起改變的解放者本身就是混雜身份的承擔者』(Homi Bhabha, 2004:55)。

語言、歷史和文化是身份的深層底色,從根本意義上塑造著人的思想觀念和集體無意識。在運用殖民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實現本土語言茨瓦納語和歷史文化的針對性融入,是尤妮蒂·道建構女性主體身份的另一種有效策略。『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是墮落的,一個沒有過去的民族是沒有靈魂的。』^②博茨瓦納第一任總統塞萊茨·卡馬(Seretse Khama, 1921—1980)如是說。這一表達肯定了歷史和文化傳統對於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作品中,涉及到博茨瓦納傳統文化中的文化方面和社會實踐,尤妮蒂·道常使用茨瓦納語來進行精確解釋或是定義。例如『Phekola』(巫術中的強身儀式、增強儀式)、『depheko』(宗教祭儀)、『borekhu hunting』(橡膠/樹脂狩獵),並且尤妮蒂·道作品中的人與物大多都有自己的茨瓦納名字,這些名字有其相對應的茨瓦納文化意義,例如莫薩的名字『mosadinyana』意為『小女人』、博茨瓦納的貨幣普拉『Pula』意為『下雨』,這是出於本地氣候幹旱,當地人對雨水的渴望反映了金錢的可貴與難得。在博茨瓦納的文化中,名稱包含對人與事物的期望,是對起名者心理預期的滿足。透過尤妮蒂·道作品,可見她在批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觀念時,也在捍衛自身優秀文化傳統。

尤妮蒂·道塑造的女性人物懂得利用所學知識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能夠在本土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以及學校中歐洲的教育模式與當地家庭中的教育理念之間尋找平衡點,從而實現對自身身份和本土文化的深度認同。這正是對『非洲性』理念的恰當詮釋,『非洲性……就是指非洲及非裔人民對源自非洲大陸歷史文化的深層認同和對那片故土的深層依戀,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閡、牢記歷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質。』(朱振武, 2025:57)實際上不僅是尤妮蒂·道,許多享有國際影響力的非洲女性作家例如貝西·黑德(Bessie Head, 1937—1986)和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等在作品中揭示社會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現象,揭露社會、傳統文化以及人性的陰暗面,是出於對非洲現實的真實關切,企盼非洲國家能夠在妥善解決現有問題的基礎上擁有更加富有前景的未來。她們不僅抨擊殘酷的社會現實,同時還展現了



非洲社會中的淳樸民風，並表示每位個體都應當『重視自己的文化；相信自己、不要忘記自己的文化和歷史』（Maitseo M. M. Bolaane, etc., 2009:16）。

三、婚姻理念的革新

要考察性別平等的真實實現程度，婚姻關係中的女性地位與生存狀態無疑是一個關鍵指標。從比較視角來看，西方國家的離婚成本顯著高於非洲國家。以典型西方國家為例，當婚姻因男方過錯而破裂時，男性不僅需要分割共同財產，還需承擔持續性的經濟責任，包括支付高額配偶贍養費以及子女撫養費。這種制度設計體現了對婚姻關係中弱勢方的保護機制。然而尤妮蒂·道在小說中反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鏡像：在博茨瓦納的婚姻解體中，男性僅需支付若干頭牛即可單方面解除婚姻關係及親子關係。這種象征性的補償機制不僅折射出婚姻制度中對女性價值的貶抑，更暴露出社會結構性性別歧視的深層問題。因而，選擇將婚姻中性別平等的觀念以文學實踐的方式植入作品是尤妮蒂·道直面結構性性別歧視的表現，也是其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刻內涵。

通過進一步分析四部小說作品的文化維度可以發現，博茨瓦納的婚姻理念與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存在驚人的相似性，即都將婚姻視為家族聯盟而非個體結合。在這種婚姻範式下，妻子被物化為丈夫的附屬品，其社會角色被嚴格限定在『私人領域』，需要承擔家務勞動和子女養育職責。而男性則壟斷『公共領域』的經濟活動與社會資源，這種基於性別的空間區隔導致女性既喪失了家庭決策權，又被系統性排除在社會發展進程之外，形成惡性循環的性別壓迫機制。這種性別壓迫機制的形成與博茨瓦納的社會現實呈現出強度關聯的特征。20 世紀 80、90 年代，艾滋病在非洲南部廣泛蔓延，其中博茨瓦納的艾滋病感染率高達 40%，導致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離世，葬禮儀式占滿了民眾的周末，整個國家一度面臨民族滅絕的危機。據數據統計，自 2000 到 2014 年，博茨瓦納的人口平均壽命降低了 25 歲（蔡高強，2014:41），其中大多數感染者為女性。小說《比遠方更遠》一開始描述了瑪拉的兩個孩子由於感染艾滋病而死以及離世後葬禮的繁瑣儀式。短時間內接連失去兩個親生骨肉，這讓瑪拉無比心痛，所以守護身邊的兩個孩子，讓他們健康活著成為了她的最大心願。

博茨瓦納女性的艾滋病感染率始終高於男性群體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社會地位低下。由於過度貧困，多數婦女要在經濟上依賴自己的男性伴侶才能生存，所以難以拒絕可能會使她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性行為；其次就是性暴力。女性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過於低下導致她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大幅度增加，女性的生殖權和健康權受到嚴重的威脅。當女性建議男性伴侶在性行為中採取保護措施時，往往被男性以不忠為由暴打。出於對男性權力的恐懼，女性無力拒絕，更不敢終止危險的性關係。《比遠方更遠》中莫薩的母親就時常面臨此種威脅，慘遭男性伴侶多次暴打。這種情況在南部非洲國家十分典型。『久而久之，這種司空見慣的性模式使以性無知、性順從為美德的女性在面臨威脅時束手無策，也容易導致男性艾滋病患者和性病患者對女性健康權和生命權的漠視』（蔡高強，2014:52）。

『博茨瓦納社會男女界限分明，在諸如婚禮、葬禮等重要儀式上，都是男人坐在椅子上，女人則席地而坐。』（徐薇，2014:55）這一情境多次體現在尤妮蒂·道的小說中。顯然，坐在椅子上的男性與席地而坐的女性交談時，前者微微低頭，後者則採取仰望姿態，傳達的正是男尊女卑的迂腐觀念。不僅如此，在鄰居的婚禮上，莫薩聽到的內容只涵蓋女性在家庭中的責任和義務，絲毫不關涉男性在婚姻中應有的付出。莫薩難以相信這是博茨瓦納傳統社會中的婚姻觀念，彰顯出莫薩和斯坦這一代青年人對於婚姻觀念的覺醒。

我把我的憤怒發泄在你身上可能不公平，但我周圍的整個社會一直將我物化，這公平嗎？把我說成是有裂縫的水葫蘆，公平嗎？把牛付給我父親，以換取我的勞動，包括生育和勞作，這公平嗎？別人

拿了錢,我的孩子就不是我的了!我被貶為性的一部分公平嗎?用從牛身上割下來的蹄子來代表我?讓我聽我丈夫的話公平嗎?毫無怨言地服侍他?容忍他的毆打和不忠?(Unity Dow,2000:156)

面對莫薩的重重反問,斯坦無奈坦言:『我無法改變周圍的整個社會。你也做不到。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是這麼做的』(Unity Dow,2000:156)。面對強大的傳統力量,男性知識分子即使試圖伸出援助之手也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可見,在傳統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現實語境下,非洲女性主義思想體系的完整構建依然是漫長而久遠的過程。

儘管尤妮蒂·道在《比遠方更遠》《無辜者的尖叫》和《天堂可能墜落》三部作品中更多呈現的是女性在博茨瓦納婚姻與社會中受到的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壓迫和傷害,但在《平衡真相》中,尤妮蒂·道讓讀者看到了莫內的母親和祖母所擁有美好愛情和婚姻,有效再現了婚姻中的性別平等觀。瑪拉特(Marato)與丈夫因真摯愛情結合,儘管兩人的婚事因男方家族受詛咒而遭到瑪拉特父母的反對,她仍堅持婚姻自主。其父後來對女兒莫內坦言婚禮當天是他今生最幸福的日子,並為此創作了最動人的贊美詩。這種美滿婚姻在祖輩亦有體現:祖父曾冒著生命危險跳上火車找回為祖母購買的金耳環。通過了解這些家族故事,莫內深刻理解了愛情的價值,形成了性別平等與婚姻覺醒的觀念。

婚姻是理清女性社會、政治與經濟地位的一個重要考量維度,其中滲透的性別觀關乎非洲女性主義思想的完整構建。『女性的人權不僅僅是私人的事情,而是跟其他種類的人權一樣,可以直接延展到國家、社會和公眾領域的深層運轉。女性的人權比任何其他現象都更加清楚地闡釋了所有權利種類之間的關聯性。』(Oloka-Onyango, J. & Sylvia Tamale,1995:711)每一個國家都由獨立小家庭組合而成。儘管國家的構成形式更為系統、復雜,但本質上而言,家與國是相似的存在。因而從觀察女性在小家庭中的位置可以窺見女性群體在整個國家中的處境。尤妮蒂·道在作品中不僅呈現出博茨瓦納女性群體在婚姻和社會中的困頓處境,也展現了新一代茨瓦納女性知識分子對於性別平等婚姻理念的精神覺醒,為非洲女性主義思想體系的完善提供了文學文本基礎。

四、集體思想的實踐

對集體主義思想的借用與化用是尤妮蒂·道構建茨瓦納女性主義理念的方法論基礎之一。『集體』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他1762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盧梭也是最早對集體主義進行系統表述的人(王繼榮,1999:144)。他認為,正是由於私有製的出現,破壞了人的自由與平等,導致人們之間因利益而產生衝突,人類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了威脅和阻礙。試圖去除這些威脅和阻礙,人們就必須聯合起來,形成更大的團體力量。因此,集體力量的有效發揮利於人類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尤妮蒂·道在作品中不僅涵蓋了權力統領方和壓製方,也塑造了懂得借助集體力量維護自身生存權和發展權的茨瓦納女性,是對南部非洲烏班圖(Ubuntu)哲學思想蘊含的代表性體現。『烏班圖』的根本蘊涵是指『一個人只有通過他人才能成為人』(Augustine Shutte,1993:46),突出了他者對個體的重要性。『這種強調個人與他人關係的集體觀念使得非洲作家註重自我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朱振武、李丹,2022:174),尤妮蒂·道就是這類作家的優秀代表。

『一個人的宗教觀念可以對其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他的意識、情感和行為。』(周海金,2014:197)除了宗教觀念之外,博茨瓦納社會的傳統觀念也塑造著人的思想,影響著個人的行為。『家族與宗族觀念是茨瓦納文化的核心。』(徐薇,2014:101)博茨瓦納傳統文化中,集體的觀念十分受重視。個人與集體可以被看作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個人是整體的一部分,而整體是所有個人



的組合。盧梭認為整體中的個人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從整體裏獲得自己的生命與存在……每個公民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會等於無物,就會一事無成。』(盧梭,1980:54)正如茨瓦納諺語所言『一座著火的房子勢必會威脅到鄰居的房子,導致鄰居的房子著火。』(matlo go sha mabapi)指出了博茨瓦納社會文化中民眾生活之間的關聯。『任何由兩只或更多的狗襲擊的事物都註定會被制服。』(setshwarwa ke ntsa pedi ga se thata)都闡明了集體力量的強大作用。

集體力量的作用不僅體現在社會風俗層面,也顯露在女性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實際行動之中。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艾滋病肆虐非洲大陸的高峰期,博茨瓦納的艾滋病感染率也在不斷攀升。起初人們只是在周末參加同村落居民的葬禮,但是逐漸發展為周一到周五也被占據,人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前往死者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小說《比遠方更遠》一開始便是在講述瑪拉大兒子的葬禮。葬禮儀式繁瑣,流程複雜,需要多位村民的協助。《比遠方更遠》中莫薩通過組織團隊詩歌表演,揭露校園性侵問題,直接促使教育部成立專案組展開調查;《無辜者的尖叫》裏的阿曼特則從一件血衣入手,聯合女性律師組建偵探小組,最終揭開被掩蓋多年的宗教祭儀案件真相。這兩個案例生動詮釋了當女性將個體覺醒轉化為集體行動時,不僅能突破結構性壓迫,更能推動社會變革。尤妮蒂·道通過筆下人物表明,女性權益的爭取從來不是孤獨的戰鬥,而是需要有機地凝聚群體力量的過程。

集體力量的有效施展無法脫離智慧個體的引領和決斷。針對非洲國家宗教祭儀這類案件頻發的現象,許多非洲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其加以呈現。《無辜者的尖叫》便是典型的作品代表。宗教祭儀指的是以謀殺的方式結束青少年女性的生命,進而利用其身體的關鍵部位製作類似於藥引子之類的物品。這類物品在南部非洲稱作『穆蒂』(muti),在博茨瓦納稱為『蒂非可』(dipheko),其作用是助力權勢人物獲取更大的物質財富和職位晉升。『活人祭儀並不是人們所共知的常識或行為,而是社會少數成員之間的秘密。它代表的是特權階層對權力的誤用和濫用,為社會中的多數成員帶來極大的痛苦。』(John Kirimi M Raiji, 2016:14)所有人都清楚這一行為必定由某個或者多個大人物操縱,難免在理清案件時會心存恐懼。然而,女主人公阿曼特在鼓勵大家共同揭示事件真相時談到,『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潛藏著惡魔麼?如果我們被恐懼嚇倒,如果我們都不敢面對這種邪惡,有誰會註意到無辜者的尖叫聲呢?』(Unity Dow, 2002:214)尤妮蒂·道在採訪中坦然說到自己曾因塑造阿曼特這一女性角色而遭到批評,因為她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角色』……對於一位博茨瓦納女孩來說,她顯得過於堅強,甚至敢於直接挑戰警察。尤妮蒂·道對這種批評回應道:『我們可以做夢,不是嗎?』(Daymond, Margaret and Margaret Lenta, 2004:51)

集體主義思想的實踐不僅體現在尤妮蒂·道本人的英文名字『Unity』(聯合、團結)中,更顯現在她的文學創作和人權活動層面。在揭發宗教祭儀案件時,尤妮蒂·道筆下的女主人公倡導女性團結一致,共同解決難題;在維護女性和孩童基本人權方面,尤妮蒂·道充分借助了國際法的力量,並於20世紀90年代在博茨瓦納掀起了一定規模的女性主義運動,宣稱博茨瓦納《公民法案》存在對女性公民的歧視,違背了國家憲法、國際法以及博茨瓦納已同意加入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Sylvia Tamale, 2001:101)。烏幹達女性人權活動家斯維亞倡導『非洲女性應當運用國際化的思考方式,並且在地方採取行動。婦女活動人士面臨的挑戰是發展創新的方式來援引國際條約,從而加強我們國內對女性平等權利的保障』(Sylvia Tamale, 2001:103)。在1994年博茨瓦納一件有關父權製霸權的案件判決中,尤妮蒂·道指出只有當女性與男性一樣擁有同樣的合法地位與權利,非洲才算是逐步走上了民主發展之路。區域無法保持孤立,也無法僅僅實現信息自我傳達,結果就是世界肯定是會影響區域(Unity Dow, 2001:319)。人們應當把針對女性的非歧視性條約、法則以及尊重女性的觀念和思想在教育 and 日常生活中普及,並充分利用國際法和重要女性主義組織的條約,以此來維護和保障女性的根本權益。

女性維護自身的權益並不意味著要將男性群體放在對立面,更不能組建女性幫派來與男性抗衡。這是

尤妮蒂·道在四部小說中傳達出的共性觀點。『任何想把女人組成幫派的企圖都將面臨一個結果——註定失敗,此外還會給她們的自尊造成更大的傷害。』(伊蓮·摩根,2007:234)這與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的觀念不謀而合,因為『女性主義絕不是弱者試圖變為強者的思想,女性主義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③。這也是博茨瓦納作家和人權活動家尤妮蒂·道借由文學創作和切身實踐所期盼達到的一種社會理想。

五、结语

『寫作是一種號召,是一種超越博茨瓦納國界限製的嘗試』^④。作為一位具備強烈非洲本土意識和人道主義情懷的流散作家,尤妮蒂·道並沒有把視野局限在博茨瓦納,而是心系整個非洲大陸,充分體現了其所具備的世界意識。她在作品中關注的議題,包括艾滋病肆虐、宗教祭儀頻發、權力濫用、女性和孩童等弱勢群體的權利慘遭踐踏等是整個非洲大陸面臨的普遍現象,以流散書寫的方式揭露和呈現這些深刻的社會議題,是希冀這些問題在現實中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處理。『『流散癥候』作為非洲文學的獨特表征,對於正確認識世界各地的文學現象、創作發生和文化成因,揭示其復雜的源流嬗變和深層的世界文學文化意義,具有重要價值。』(朱振武、黃鈴雅,2022:8)沿著主體身份的構建、婚姻理念的革新和集體觀念的實踐這一創作脈絡與思想內核,尤妮蒂·道嘗試按照博茨瓦納本土文化中女性存在的社會空間和文化傳統,進一步將討論的範圍擴展至全體非洲女性的共性需求。正如非洲文學研究者所言:『在全球女權與人權運動的影響下,非洲女性必須為自己的權利而戰。那些使我們處於弱勢的結構與觀念,必須被廢除。』尤妮蒂·道立足非洲的現實語境,通過文學創作和人權活動實踐構建了自身區別於西方女性主義話語框架的茨瓦納女性主義核心理念,不僅豐富了非洲女性主義思想,更推動了全球女性主義思想的歷史發展進程。

注釋

- ① Pauline Dodgson-Katiyo. Women investigators uncovering transgression in Unity Dow's fiction,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Press, 22.
- ② Graduation speech as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Botswana, Lesotho, and Swaziland on 15 May 1970 (Botswana Daily News, 19 May 1970, supplement, qtd. In Tlou, Parsons, and Henderson 314).
- ③ 轉引自新京報書評周刊:《開場:女性學者訪談》,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頁29。
- ④ See Fetson Kalua. (2009). Identities in transition: Unity Dow's *Far and beyon'* and *The screaming of the innocent*. *Scrutiny 2: Issues in English Studies in Southern Africa*, (14) 2, 51.

參考文獻

- ① Augustine Shutte (1993). *Philosophy for Africa*, Rondebosch: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 ② Daymond, Margaret & Margaret Lenta. (2004). It was lik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An interview with Unity Dow. *Kunapipi*, 26 (2), 47-60.
- ③ Dow Unity. (2002). *The screaming of the innocent*.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 ④ Dow Unity. (2003). *Juggling truth*. North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 ⑤ Dow Unity. (2000). *Far and beyon'*.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 ⑥ Dow Unity. (2006). *The heavens may fall*.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 ⑦ Dow Unity. (2001). How the global informs the local: The Botswana citizenship case. *Healthcare for Women*, (22), 319-331.
- ⑧ Fetson Kalua. (2010). Identities in transition: The 1990 high court case and Unity Dow's *The heavens may fall*. *Journal of Literary*



- Studies*, (26)2, 80–89.
- ⑨ John Kirimi M' Raiji. (2016). An overview of occultism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Unity Dow and Emmanuel Mbogo. *LASU*, 4 (4), 9–19.
- ⑩ Homi Bhabha. (200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 ⑪ Maitseo M. M. Bolaane, Mary S. Lederer & Leoba S. Molema (ed.). (2009). *Botswana women writ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 ⑫ Oloka-Onyango, J. & Sylvia Tamale. (1995).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or why women's rights are Indeed human right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feminism.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7)4, 691–731.
- ⑬ Sylvia Tamale. (2001).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Us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for women's empowerment in east Africa. *Agenda: Empowering Women for Gender Equity, African Feminisms One*, (50), 97–104.
- ⑭ 蔡高強:《非洲愛滋病問題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⑮ 盧梭著:《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 ⑯ 泰居莫拉·奧拉尼央,阿托·奎森(主編),姚峰,孫曉萌,汪琳等(譯):《非洲文學批評史稿》(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 ⑰ 王繼榮著:《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論綱》,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⑱ 新京報書評週刊:《開場:女性學者訪談》,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
- ⑲ 徐薇著:《博茨瓦納的族群與社會生活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⑳ 伊蓮·摩根(著),劉筠(譯):《女人的起源》,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
- ㉑ 周海金著:《苦難及其神學問題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㉒ 朱振武,黃鈴雅:《非洲作家的諾獎之路與流散類分》,《人文與社科亞太學刊》,2022年第3期,頁1–9。
- ㉓ 朱振武:《中外文學的傳播互鑒與歸異平衡——以『中國非洲文學學』的建構理路為中心》,《外國文學研究》,2025年第1期,頁50–58。
- ㉔ 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學與文明多樣性》,《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8期,頁163–184+208。
- ㉕ 朱振武,薛丹巖著:《博茨瓦納英語文學進程研究》,重慶:西南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